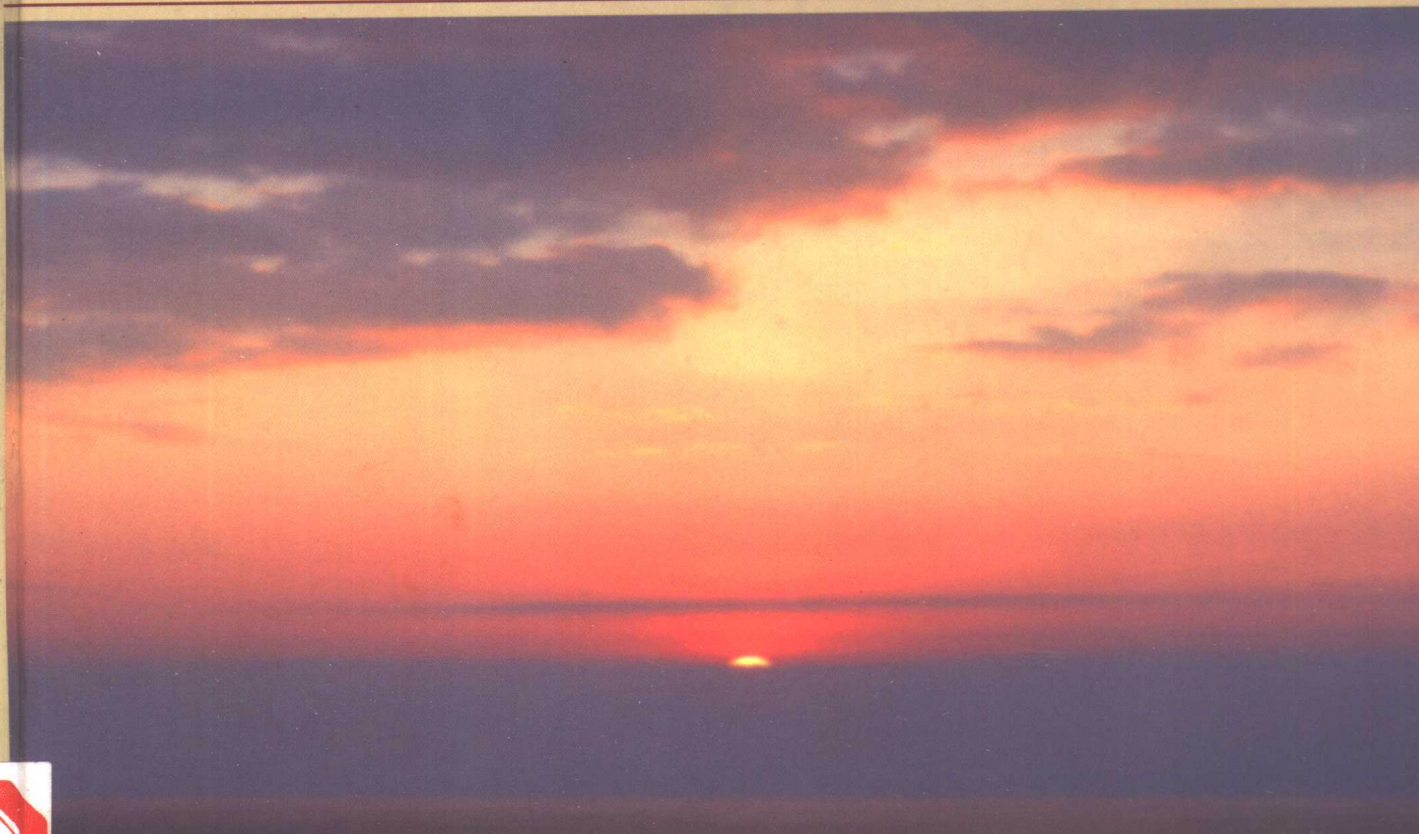


洛阳文物与考古

耕耘论丛

(一)

洛阳市文物局 编



科学出版社

洛阳文物与考古

耕耘论丛

(一)

洛阳市文物局 编

科学出版社

1999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洛阳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论文选集,其内容包括考古学、博物馆学、石窟寺以及考古绘图、摄影等技术方面的研讨论文。考古学论文涉及原始社会至唐宋时代社会性质、青铜器纹饰、钱币铸造及墓志考释等;石窟寺方面对供养人以及受印度佛教的影响等诸多方面作了研讨;博物馆学方面则对博物馆的精品陈列及博物馆的管理等作了探讨。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学、史学、博物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工作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耕耘论丛(一)/洛阳市文物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洛阳文物与考古)

ISBN 7-03-007814-4

I. 耕… II. 洛… III. ①文物-考古-河南-洛阳市-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河南-洛阳市-文集 IV. K982.6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4607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新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9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3/4

印数:1—2 000 字数:406 000

定价: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杨中〉)

1999.11.9

考古书店

《洛阳文物与考古》编辑委员会

主 任：马学曾

副主任：郭引强 石 磊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曾	王 绣	方孝廉
石 磊	朱 亮	刘景龙
张 剑	苏 健	李文生
李德方	陈长安	余扶危
赵振华	郭引强	徐金星
蔡运章		

序

这本集子即将面世了！虽说三年前我对其中的内容还并不是十分了解，但今天我却是十分地热爱她。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一向知道她很古老，但三年来却感悟了她有那么深邃的内涵，深知了她在我们华夏民族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我去过白马寺，也到过龙门石窟，直到我真正投身于此项工作，才深切体会到她们的存在不单单是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代表，她们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在融合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在激发民族热情、提高民族斗志、宣传教育群众、发扬传统文化等方面竟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

文物，特别是出土于这块土地上的文物，凝结着历朝历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心血和汗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洛阳北窑发现的旧石器，时间大约距今 10 万年左右，它使人们看到了洛阳文化延绵不断发展的源头，同时也让我们为原始人类聪明的才智感到震惊；洛阳西郊的王湾文化，集中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发展阶段，人们在深入研究它本身文化内涵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它孕育着后一时期文化的因素；二里头文化，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不久就被众多的学者认定为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夏代文化；其后的商王朝，因其盘庚迁殷而分为前期和后期，偃师商城自 80 年代初被发现后就一直是关注和争议的焦点，经过反复的推比论证，可以认定它是商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城址之一；西周时期，洛邑建成周城，被认为是开了我国历史上众多王朝两京制的先河；此后的 100 平方公里范围的汉魏故城，至今仍处处可见汉魏科技文化高度发展的浓浓遗迹；隋唐时期，洛阳成为世界东方繁荣的商业都会，不管是发掘的遗迹还是出土的遗物，无不处处再现着大唐帝国辉煌的过去，特别是至今仍吸引着众多游人的龙门石窟，登峰造极的石刻艺术使参观者流连忘返、赞叹不已。

洛阳辉煌的历史文化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是由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孕育和培养出来的，同时也是洛阳乃至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研究的成果。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曾最早在洛阳拉开，一大批考古学大家曾在洛阳久久地翻动着一层层凝重的历史遗痕。应当感谢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也感谢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多少年来对洛阳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支持，当然这里最值得写上一笔的是洛阳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许许多多基础工作都是他们做的。应该说，洛阳凝重的历史地位能被学术界所认可，洛阳优秀的历史文化能尽展昔日的风采，都与洛阳文物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劳动分不开。这里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洛阳的文物考古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退休仍孜孜不倦地在整理资料、撰写文章，我常常为这些学者们的敬业精神所折服，特别是

他们透过几千年堆积的地层去对历史的探秘,他们通过一堆堆陶片去研究朝代更迭变换,那是只有亲身体验后才知道这里面的艰辛,这里面的苦涩和那永无止境的探索追求。人们了解洛阳,向往洛阳,正是通过这些历史的遗留才得以有所收获。但我总觉得目前的这些还不是洛阳的全部,这也是我真正参与了这项工作后才体会到的。洛阳昔日的辉煌,洛阳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古人已做了评价,“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留给后人的是一部史书,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巨著。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发扬、借鉴历史经验,更重要的还有对她的再现和利用。但这些工作都还做的不够,都还与洛阳的历史地位有相当大的差距,都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继续努力。这是一项需要前赴后继的系统工程,我们深深感到在这项系统工程中所担负的历史重任,紧紧抓住对中青年业务人员的培养对于完成这项工程至关重要,于是才有《耕耘论丛》的出版。

马学曾

1999年8月6日

目 录

生殖崇拜与中国史前人类社会形态·····	张灵威(1)
关于夏代立国前后的一点浅思·····	李 虹 刁淑琴(6)
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初步研究·····	桑永夫 刁淑琴(9)
试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短剑 ——西周青铜兵器研究之四·····	高西省(24)
对洛阳东周墓的一些认识·····	王志远(38)
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区铸钱遗存及其相关问题·····	霍宏伟(43)
济源出土平首布探讨·····	张玉芳(62)
洛阳金谷园汉墓出土陶坊用途的探讨·····	陈 新(70)
洛阳五女冢 267 号新莽墓朱书陶文的书法艺术·····	史家珍(77)
谈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陶瓷扁壶·····	邢富华(82)
龙门石窟北朝洞窟的形制·····	曹社松(91)
佛教在北魏的发展及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在龙门石窟的表现·····	侯玉珂(94)
龙门石窟新发现的两座唐代瘞窟·····	吕劲松 杨超杰(100)
龙门 307 窟·····	杨超杰(103)
略论龙门石窟唐代造像中的秣菟罗艺术因素·····	张乃翥(114)
供养人 ——历史人物的真实画卷·····	顾彦芳(123)
龙门古寺史迹拾零·····	王振国(132)
北魏元邵墓反映的经济文化现象·····	郎保湘(139)
北魏货币制度初探·····	马卓娅(146)
唐卢处约及妻李氏墓志考释·····	宋云涛(150)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志考略·····	谢虎军(162)
五代后唐杨凝式撰《李德休墓志》考释·····	李春敏(171)
洛阳发现的古代钱币纹饰·····	程永建(175)
洛阳“仁寿镜”年代试析·····	李随森(186)
酒泉十六国墓大树壁画及墓主族别试探·····	徐婵菲(194)

李村宋墓艺术浅说·····	黄吉博(198)
我国古代运河的形成及其作用·····	李 娟(206)
卫立煌与洛八办·····	王爱文(211)
考古发掘中出土遗物的处理及其保护·····	岳金合(215)
对考古绘图的一点体会·····	尚巧云(218)
浅谈考古摄影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周 立(231)
浅析《洛阳文物精华展》的陈列特色	
——兼谈提高博物馆陈列质量的几点认识·····	王献本(234)
试谈基本陈列的有关问题·····	刘莲香(240)
博物馆图片展示设计之我见·····	画 晓(24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	沈淑玲(247)
浅谈博物馆商店的发展趋势·····	白 敏(251)
文物市场的历史现状与对策·····	曹先武(254)
洛阳县知事曾炳章的文物事迹钩沉·····	赵振华(257)
关帝崇拜信仰民俗初探·····	刘百灵(261)
试论民间剪纸艺术·····	常定国(265)
浅议计算机在文物保卫工作中的应用·····	杨明登(271)

生殖崇拜与中国史前人类社会形态

张灵威

(洛阳都城博物馆)

生殖崇拜现象产生于原始社会对于自身再生产的迫切需要,就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各个民族都或早或晚地经历过生殖崇拜的阶段。中国的生殖崇拜出现在原始社会早期。生殖崇拜的出现,促使了中国史前人类社会形态的形成。而社会形态又是生殖崇拜现象的必然载体。

一、生殖崇拜产生的时代背景

生殖崇拜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原始社会的早期,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原始先民要生存,但无论是农业活动、采集还是渔猎,单靠个人的力量远不能获取足够的食物,必须发挥群体的作用。但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原始部落间的纷争、天灾、疾病等因素,都使得原始先民的平均寿命很低。因此,原始先民们在与大自然抗争的同时,祈求人类自身的繁衍便成了当时的迫切需要和最大愿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的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当人们惊喜地发现,一旦人的交合,便能够诞生生命、繁衍后代时,就会本能地、自然而然地对生殖产生原始的敬畏与崇拜。黑格尔说:“在讨论象征型艺术时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②他这里主要指的是印度等地,但中国也不例外。这说明生殖崇拜具有世界范围的共性。生殖崇拜不仅有其自身演变的轨迹,更有着明显的阶段性。而这个阶段性无疑是从女性生殖崇拜开始的。

二、中国原始社会的女性生殖崇拜

中国原始社会的女性生殖崇拜,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当然这是结论的话。要考察产

生女性生殖崇拜的原因,仍然离不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时,农业是重要的经济形式,而担负主要职能的是女性。同时,女性还担负着采集、纺织和缝纫。男子主要从事渔猎、畜牧。不过,当时渔猎经济的作用已大大下降,而畜牧业尚处于较原始的阶段。故此在社会生产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女性,她们事实上已成为家族、氏族乃至社会的主宰。这时出现女性崇拜是毫无疑问的。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仰韶彩陶图》上绘的舞人形象就是女性崇拜的产物。画面上共十五人,五人一组,作手牵手跳跃状,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女性在庆祝丰收,抑或是在主持巫术仪式。总之,她们在显示自己的主宰权力和力量,正是原始社会早期女性崇拜的体现^③,其次,由于原始先民们对自身再生产的渴望,但又对生育知识知之甚少,仅从表象上看,女人能够生儿育女,能够传宗接代,能够满足子孙繁衍不绝的心理欲求,同时,又明白了孩子从女人的那个地方生出来,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对女性生殖器官的顶礼膜拜式的虔诚和崇拜。弗洛伊德曾在一篇论文中说“……生殖器起先是生命的自豪和希望,它们被崇拜为神,它们把它们功能的神性传导给所有开始掌握知识的人类活动。”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原始先民们以率真、坦露、直朴的风貌刻意地去渲染女性的生殖器官——女阴。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彩陶壶,器表上塑绘了一个女像。其乳房、脐、阴部及四肢裸露,夸张捏塑的女阴,又刻意着黑彩加以渲染^④。又如,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一些女性塑像,仅乳房就有一批。一个红陶裸体女塑像腹部隆起,臀部肥大,下身特意用三角形压印纹表示女阴^⑤。原始先民在崇拜女阴的同时,又注意其构造,寻找其象征物,从而衍生出许多状似女阴的崇拜物,又进而以文化方式给予写实性地再现和抽象化表现。中国许多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绘有或刻有鱼纹。如西安半坡彩陶上鱼纹,或为写实,或为抽象,可以排出完整的序列。稍晚出现的蛙纹,分布更为广泛。蛙纹既有写实的,也有抽象化的,纹样丰富多彩。花卉等植物纹样也较为普遍地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陶器上。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表明,这些或为写实,或为抽象的鱼纹、蛙纹、花卉植物纹都是女阴的象征^⑥。无独有偶的是,有的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认为母系氏族社会出现的抽象鱼纹,如“×”(双鱼对顶);“*” (四鱼两两相顶),均为生殖崇拜的表现形式,以示雌雄配合,表达了原始先民对生殖繁衍的一种愿望^⑦。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因为从表象上看,鱼的轮廓,特别是母系氏族社会陶器上常见的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相似;蛙的肚腹与孕妇的肚腹一样,浑圆而膨大;而植物花卉纹的叶片状似女阴。从内涵上讲,无论是鱼、蛙还是植物花卉,繁殖力都十分旺盛,这使得渴望子孙繁衍不绝的原始先民们,希望通过对鱼、蛙及花卉植物的崇拜,而起到生育功能的转换或者加强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闻一多指出,中国人从上古起以鱼象征女性,象征配偶。他认为,鱼的这一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而且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繁衍直接相关^⑧。著名美学理论家李泽厚也指出:“像仰韶期半坡彩陶屡见的多种鱼纹和含鱼人面,它们的巫术礼仪含义是否就在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⑨而且据此我们又不难发现,原始先民们对于女性生殖器官的崇拜,已经从象形进而会意了,抑或是说原始先民对于生育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最早

的鱼状女阴,始而崇拜鱼,进而崇拜肚腹浑圆、形若孕妇的蛙,实则崇拜女性的生殖器(怀孕的子宫),这正是人类对于女性生育功能认识的一个深化。而这个认识过程深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当原始先民们终于明白了人类如何能够绵延生命的原因时,其生殖崇拜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男性生殖崇拜也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男性生殖崇拜一经出现,便逐渐改变了女性生殖崇拜温顺的内涵,而是表现得那么威猛,那么桀骜不驯。

三、中国原始社会的男性生殖崇拜

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存在着男性生殖器——男根的崇拜,如许多父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祖、石祖、玉祖等。但男根崇拜的出现实际上要早得多,它实际发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晚期。赵国华同志在《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中用大量翔实材料,论证了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彩陶纹饰,如鸟纹、蜥蜴纹、龟纹、蛇纹等,即为男根的象征。中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存中,鸟纹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纹饰。它首先见于母系氏族社会早期文化西安半坡类型的彩陶残片;临潼姜寨二期彩陶葫芦瓶上绘有鸟纹;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的文化类型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残片上有鸟纹;宝鸡北首岭彩陶壶上有鸟纹;华县泉护村彩陶上有鸟纹等。至于母系氏族社会前期出现的彩陶鸟纹或鸟衔鱼纹,以及抽象的对顶鱼纹等,以笔者浅见,当是原始先民对繁衍后代的一种解释,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虽然原始先民起初不了解男性的生育作用,只知道女性的繁殖功能。但想必也认识到这毕竟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需要男女的交合。只是限于当时男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尚不重要,所以并没有意识地去突出或强化男性生殖器,没有产生对男根的崇拜。而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晚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更为发达,生产范围更为扩大,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地砍伐树木,开垦荒地。庙底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两千多件用于砍伐、敲砸的工具——盘状器,应是当时适应这一需要产生的。而从事这种繁重体力劳动的肯定为男子无疑。男子取代了女人而成为土地的主人,男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这一社会现象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的墓葬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壳龙虎图案的发现,即是明证。西水坡遗址第45号墓,墓中埋葬四人,除墓主人外,另外三人可能为人殉;墓主人两侧的龙虎图案则说明他生前地位至尊,具有降龙伏虎的神威,凌驾于整个部族之上^⑩。结合早期墓葬中出现的女性厚葬情况,说明了在中国原始社会的中、晚期,男、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男人们逐渐观察到或者感悟到,鸟类、蜥蜴、龟、蛇等并不是直接繁殖后代,而是先生卵,后孵化出小生命来。这使男人们认识到,新生命是由卵发育而成的。联想到男性生殖器也有两个“卵”,又联想到男女交合后,女人分娩婴儿又有胞衣,故认为生育女乃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从而认识了男根特有的生殖机能,亦即悟出了“种”的作用。这是原始先民们对自身生育功能和繁殖过程的又一次深化,是一次质的飞跃。故此,原始先民们把鸟、蜥蜴、龟、蛇等作为男根的象征,进行崇拜。至此,作为女阴崇拜的象征物鱼纹

已呈渐趋消失,而鸟纹等纹饰渐趋流行。庙底沟彩陶上的鸟纹可以排出从写实到写意再到抽象的发展序列。特别是庙底沟出土的一个陶塑鸟头,这一形象已非写实,从系象征,它以特定的形状,尤其是以颈部螺纹似的皱折向人们毫不含糊地展示了鸟纹、鸟形象征男根的意义^⑩。时至今日,人们还常用“鸟”、“龟头”等称呼男根,足以说明男根崇拜的影响力。原始先民由女阴崇拜发展为男根崇拜,更由于男根崇拜对“种”的推重,为以后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最终确立提供了血缘依据。

中国原始社会中、晚期出现的男根象征物,如鸟、蜥蜴、龟等,都是性情较为温和的动物。但随着整个社会由女阴崇拜转变为主要崇拜男根,促使男性十分看重自己生殖器的价值,从而推动了男性的觉醒。男性开始有意地炫耀男根的威风,为此,出现了以蛇、山、虎、野牛等象征男根。李泽厚对此有精辟的见解。他概括新石器时代的纹饰变化时说:“这就是同属抽象的几何纹,新石器时代晚期比早期更为神秘、恐怖。前期比较更生动、活泼、开放、流动,后期则更为僵硬、严峻、静止、封闭、惊畏、威吓。”“在后期的几何纹饰中,使人清晰地感受到了权威统治力量的分外加重。”^⑪他认为:“山与男性生殖器崇拜可能有关。”这是原始社会后期男性居于支配地位,为了表现男性主宰世界之能力,而把男根的外形与凶猛、雄伟的内涵相结合。同时,男根崇拜出现以后,原始先民们曾直接奉祀过男根的模仿物,如陶祖、石祖等。如宝鸡福临堡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石祖和陶祖各一件^⑫。又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层中曾出土一件残长3.5厘米的泥质红陶祖系泥质雕塑,头端镂空以表示男性生殖器的尿道,写实性很强^⑬。又如属庙底沟文化另一种类型的河南汝州市洪山庙一号墓出土的陶器上,不仅绘有人物、动物(龟、鸟、鹿、蜥蜴)、太阳、月亮等,更由于在几件陶缸上所绘的男性生殖器图案,表示出强烈的男性生殖崇拜的意义。洪山庙一号墓陶缸上彩绘的男性生殖器图案,与解剖学的男性生殖器十分相似,古人夸张地绘出生殖器前端的尿道。其生殖器图案不但形象,而且过分夸大,如W10上的图像长达20、宽4厘米W116上的图像更加粗壮,又如W39上塑出的生殖器约占人体下腹宽度的1/3,占突出位置。加之又特意以泥条塑出,显然制器者在有意表现男性生殖器官。而且几件陶缸都是作为葬具使用的,除W39所葬人骨无法断定性别外,其他W10、W53、W116里所葬皆为成年女性。其寓意当都是崇拜男性生殖器达到后代繁盛的目的^⑭。

四、生殖崇拜与中国史前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序列

其实,这个结论或许在前文里就已经得出了。中国原始人类社会之所以迈进母系氏族社会,是因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加之原始先民们为祈求其自身的再生产,但又对人类生育功能不甚明了,始而崇拜女性生殖器官,继而崇拜女性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而随着男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and 男性生殖崇拜的出现,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演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仅反映在社会形态的变革上,也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变化上。无论是女性生殖崇拜,还是男性生殖崇拜,其实质都是原始先

民对女性、男性在种的繁衍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承认和推重。正因为认识的局限性,所以才有了阶段性。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程中,庙底沟文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注 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 ② 《美学》第3卷上册,4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 ③ 张灵威:《试论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河洛春秋》1990年4期。
-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青海柳湾》(上)116页;同书(下)彩版二,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⑤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
- ⑥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1期。
- ⑦ 王鲁昌:《论彩陶纹“×”和“*”的生殖崇拜内涵——兼析生殖崇拜与太阳崇拜的复合现象》,《中原文物》1984年1期。
- ⑧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闻一多全集》第1册,1948年9月。
- ⑨ 李泽厚:《美的历程》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 ⑩ 濮阳市文管会、博物馆、文物队:《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1期。
- ⑪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1期。
- ⑫ 李泽厚:《美的历程》35—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 ⑬ 王兆麟:《宝鸡发现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址》,《人民日报》1988年4月4日第一版。
- ⑭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1期。
- ⑮ 袁广阔:《洪山庙一号墓男性生殖器图像试析》,《中原文物》1995年4期。

关于夏代立国前后的一点浅思

李 虹 刁淑琴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原始社会晚期,阶级分化,部落林立,各部落之间你争我夺,战争频繁,这在古史传说中有许多反映。如果夏确是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那么,其创始者禹或者启必将不可避免地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统一各部落的战争。美尼斯统一埃及,萨尔贡一世统一两河流域,希腊半岛雅典和斯巴达国家的形成等等,都是如此。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部落战争,说到底也是一种阶级斗争。是通过暴力,轻而易举地对各部落进行联合或统一,事实上并无可能。那么,夏朝的建立者禹或者启,是否进行过这样的战争呢?

一、启未曾进行过统一各部落的战争

在文献上,启之时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一是“益干启位,启杀之”^①,其二是“启征西河”^②,其三是启伐有扈氏。

先看启征西河。《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述是:“(帝启)十五年,武观西河叛,彭伯寿率师征西河,武观来归”^③。武观,按《逸周书·尝表》所云:“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禽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五子,五观也,亦曰武观,启子”。从这些记述分析,第一,武观是启的儿子,武观之乱是一次叛乱,地点限于西河,属于局部战争,规模应不算大,在启命彭伯寿率军征讨之后,就平定下来了。第二,这次叛乱发生在启立国十五年后,而不是立国之前。所以,这场平叛战争类似于汉高祖时平定“七国之乱”,其目的在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与安定,而不是为了建立新的国家。

启伐有扈氏的战争,也发生在立国之后。《尚书·甘誓》记有启出征前在甘地举行誓师大会。其云:“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从这段记述看,启率六卿,御驾亲征,事情非同小可。夏师有左军、右军,当然就有中军。御非其马之正,指的是有战车。启的全部军事力量,看来都出动了。战争规模之大与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结果是有扈氏战败灭亡,夏王朝取得了胜利。

战争的直接原因,《史记·夏本纪》说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逸周书·史纪解》也说:“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不服,不恭于夏王朝,从而激怒了启,被安上“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名,大兴讨伐之师。可知这也是一场巩固夏朝统治权的斗争,与建立国家政权无关。

启益之争,是启立国前所进行的唯一见于史籍的一场战争。对此,古代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孟子·万章上》云:“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史记·夏本纪》略同其说,后世亦多宗此。这是说,启干益位,与《纪年》的“益干启位”之说不同。无论谁干谁的位,究其实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其性质类似于后世的宫廷政变,与统一各部落的战争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战国策·燕策一》讲到启益之争,发表了一通评论,说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一个“传”字,道破了启立国的天机。禹能够将(国家)权力传给启或益,则说明禹之时已经有了这种(国家)权力,不然,是无所谓传与不传的。

禹也未进行统一本土各部落的战争。

《战国策·魏策二》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墨子·非攻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惊),……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谨以待。技谗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攻三苗,是禹时期主要的军事行动。但是,禹是中原华夏诸族的代表,三苗却是南方的民族。《史记·正义》引吴起说:“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可知三苗古居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属于中原系统。所以,禹征三苗,只能视为当时的中原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讨伐,与商王武丁南征,周昭王、宣王南征相类,而不是对中原华夏各部落的统一战争。从事理看,应是中原的统一在前,对外的讨伐在后。

既然禹未曾进行统一中原各部落的战争,他的国家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大禹国家的建立,是依赖于治理洪水这一偶然的契机。据说,当时洪水滔天,人民流离失所。一些分散的部落,为免洪水之害,高筑堤防,以邻为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华夏系统各部落联合起来,共同推举禹作为自己的首领。禹经多年艰苦努力,疏江导河,使洪水得其道而泄,治理洪水成功。在此基础上,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威望,把权力操纵在自己手里,然后又把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

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关键在于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样大的洪水。对此学术界存在多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只是黄河泛滥,有的认为只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泲水或淇水泛滥^④。有的认为是禹征三苗时遇到南方潮湿的气候而传说成洪水等等。这些观点总的倾向是认为淹没九州的大洪水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第一,从我国的气候看,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雨季是不同的,不可能同时发生滔天的洪水;第二,从我国的地形看,东低西高,即使海水上涨,也只是东部地区受灾——东部地区也不全是低洼平原;第三,从传说看,禹能联

合各部落,说明各部落的居民都还存在,如洪水滔天,几年不退,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不淹死,冻、饿、疾病也会夺去大部分人的生命,禹又从哪里集合大量的劳动力开沟掘河?在洪水围困的情况下,禹的想法即使再好,恐怕一下子也难传达贯彻到原本分散的部落之中,即使传达到了,别人未必就那样相信他。因此,即使有洪水,也只能是局部的。

因为洪水是局部的,受灾的地区有限,即使真有需要组成部落联盟治理洪水,这一部落联盟的规模也不会很大,只是受灾的一线而已。这一联盟因为长期遭受洪水灾害,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应该比较弱小,也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生机,而再去举行大规模征伐三苗,会天下诸侯于塗山的行动。

洪水说塑造了一个人民爱戴的英雄禹的形象,同时也将禹以前的历史拦腰砍断了。这一代价实在过于昂贵,得不偿失。从文献看,禹治理洪水不是本人的自愿,也不是由所谓各部落共同推举的,而是因为受帝之命。《史记》明确记述,禹是受舜帝之命去治理洪水的。舜帝不是子虚乌有的神,而是人间一代帝王。他先任命禹的父亲鲧去治水,鲧治水不得法而酿成大错,被舜处以极刑。禹治水那么认真,过家门而不敢入,并不全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伤父鲧“不成受诛”,害怕再被舜帝砍头^⑤。

可见,治理洪水不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偶然契机,充其量只是为夏的立国提供一个机会罢了。

从禹、鲧是受舜帝之命行事的史实看,早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了治理国家的君主,国家必然早已存在。所以,如果说启的权力是从他父亲禹那里承袭过来的话,那么,禹的权力就是舜帝授予的。这样,统一中原华夏诸部落的军事行动,必然发生在虞舜之前。

注 释

①《晋书·束皙传》引《古本竹书纪年》,中华书局,1982年。

②《北堂书钞》卷一三帝王部引《纪年》。

③引自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正》,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十五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及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均作“二十五年”。又《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云:“(启)三十五年,征河西”,河西当即西河。

④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文物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

⑤《史记·夏本纪》:“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初步研究

桑永夫 刁淑琴

(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我们的先民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青铜文明,它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这些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创造,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思维空间和思考课题。作为青铜文明最重要和最直接载体的青铜器,无论从它的外观上,还是从它所记载和体现的历史内涵上,都促使人们去研究和探索!郑光先生在《二里头遗址与我国早期青铜文明》一文中写道:“每当我们打开文物图录,或者参观文物陈列,让人感官和心灵震动的是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造型装饰或精巧华丽,或敦厚庄重,或宏伟威严而摄入心魄。这正是当时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意识的集中表现。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明史风光独占。”^①;张光直教授认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两大特征除了玉器外,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②;李学勤先生认为“中国青铜器是世界上古代文明史上卓越的成就”^③。夏鼐先生说,中国青铜器“一般认为是上古文明世界中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④。由此可见商周青铜器历史地位之崇高了。青铜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特征:器物的制造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工艺制作水平;华丽的纹饰寓示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某些思维方式;而铭文更是直观的记录了事件的原委。在这三大要素中,纹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体现了器物的时代特征,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正因为如此,它作为青铜器研究与鉴赏的三大要素之一,无论从考古的角度还是从美术的角度,都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郭沫若先生在对青铜器铭文进行深入研究和对考古发掘进行精辟综括的基础上,对中国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进行了卓有见地的分期,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把纹饰作为青铜器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并取得了成功^⑤;1941年,容庚所撰的《商周彝器通考》^⑥一书中,首次把青铜器纹饰单列一章,系统地论述了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各种类别及其时代的特点。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更是一部研究青铜器纹饰的鸿篇巨制。他认为,青铜器研究必须结合铭文、器形和纹饰三个方面,不可偏废。而青铜器纹饰的重要性在于“不是所有的青铜器都有铭文,……而绝大部分青铜器都有纹饰。作为一种艺术的形态,商周青铜工艺还指示着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尺度。”^⑦正是由于这些前辈们的研究和倡导,青铜器纹饰的重要性已是众人皆知的了。

正像青铜器器形繁多一样,青铜器纹饰的种类也不胜枚举。但占据着商周青器纹饰最